

“扁担街”里拼出一个童装名镇

本报驻浙记者 蒋萍 通讯员 刘海波

一根扁担靠在墙上，挨着扁担的是一个硕大的黑布包和一双千层底老布鞋。“这就是改革开放初，织里人走南闯北发家致富的标配‘法宝’，后来总结为‘一根扁担两个包，一双布鞋全国跑’。”中国童装博物馆工作人员指着陈列柜一角娓娓道来。该馆位于织里中国童装城四楼，是唯一的国家级童装主题博物馆。

织里是一座千年古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太湖南岸。据介绍，早在 2000 年前，织里人就擅长种植黄麻，纺织业发达，织里便因此得名，史料中有“遍闻机杼声”的记载。有传说称，南宋皇帝赵构南渡时曾在织里一村庄借住一晚，整晚听着轧轧之声，便命名此村为轧村。

改革开放 40 年间，织里从一座“穷乡僻壤”的小镇，到年产 13 亿件童装，占据中国童装市场 50% 份额，销售近 500 亿元的“中国童装之都”，勤劳朴实的织里人也完成了从“农民创业”，到大刀阔斧办市场的“产业创新”，再到如今“产城融合、和谐发展”的壮举，织就了一幅改革开放的“织里样本”。



小肚兜奠定大产业

因“先天”条件制约，织里曾是远近闻名的“穷乡”。织里人凭着勤劳奋斗，闯出了自己的“童装王国”。

行走在织里镇吴兴大道，两旁店铺林立，大大小小招牌上写着“童装”“辅料”“布业”“纺织”等字样，车来车往和穿梭其中的“快递小哥”，眼前的场景都印证了“童装之都”的繁华与荣耀。“织里是浙北地区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市场化程度最为发达、经济增长最为快速、人民生活最为富有的地区之一。”织里镇党委副书记盛柯，脱口而出一连串“最”，底气十足。

濮新泉是这些“最”的创造者和见证者之一。这位湖州今童王制衣有限公司的董事长，16 岁从田坂里洗脚上岸，以 6 台缝纫机起家，凭着勤劳奋斗，闯出了自己的“童装王国”。濮新泉告诉记者，上世纪 70 年代末，由于人口增长、人均耕地短缺，农业生产连年衰萎，一年粮食只够半年吃，织里因而成为杭嘉湖平原出了名的“穷乡”。无奈的织里人重新操起织造手艺，纺织、刺绣、缝绗，生产床罩、枕套等织品。晚上纺织白天卖，老婆纺织老公卖，赚取利润养家糊口。“那时，一根扁担挑起两个包，没有目的地、没有终点，什么时候卖完，什么时候回家。”

走出去的织里人淘回第一桶金，许多人成为“万元户”，也带动更多织里人走上这条致富路。至上世纪 80 年代初，经营户已达数千户，销售踪迹远达东北三省。但随后，织里受到打击——当其他城市的进口绣花机开动后，家庭缝纫机无论从产量、质量、工艺上均无法与之相比，织里的床套、枕套突然没有了销量。聪明的织里人在苦恼中发现，枕套没人买了，儿童肚兜却依旧畅销。至此，织里正式进军童装产业，并很快享誉全国。1989 年，织里工商所投资 230 万元建成“织里轻纺纺织品市场”，织里童装第一次有了专门的有形市场。

上世纪 90 年代，织里迈入发展快速道。1992 年 8 月，湖州市批准成立织里经济开放区。1995 年，织里镇被国家体改委等 11 个部委批准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单位，赋予部分县级经济管理权限。这两个重大的改革举措，掀起了织里创业的第二波浪潮。1997 年，紧靠 318 国道建立的“中国织里童装市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批发商。“织里童装”区域品牌开始在全国童装市场叫响，2002 年织里镇被命名为全国唯一的“中国童装名镇”。2017 年，织里童装企业已达 3.6 万多家，成为中国最大的童装



①繁华的织里镇财富广场。 ②1983 年，织里工商所在沿河老街用玻璃铜瓦搭建了 36 个简易棚，开创了织里第一代市场。 ③童装小 T 台引领时尚潮流。(新华社发) ④织里企业使用全自动智能吊挂系统生产童装。(新华社发) ⑤小模特走秀。(除署名外，均受访者供图)

基地，城乡居民收入亦创新高，分别达到 60718 元和 36998 元。

小 T 台引领大潮流

服装加工“低门槛”带来的是“低小散”，但如今，织里强大的设计研发让“童装之都”成为“时尚之都”。

织里童装设计中心内，小模特们正在走秀，这是一家企业举办的冬装发布会。“别看我们这个 T 台小，却是新品发布的主战场，每年几百场童装秀在此举办，说其引领童装潮流亦不为过。”设计中心主任叶芳萍对小 T 台非常重视，因为织里的小模特不仅好看而且专业，最小的只有 3 岁，童装模特成为织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童装设计中心成立于 2013 年，由织里投资 2000 万元打造而成，它令织里童装有了跳跃式的发展。设计师

胡丽琼原来是织里童装厂的普通员工，而今开起了设计工作室。

“原来织里的模式是‘现抄现做现卖’，现在我们卖的是创意、设计。”胡丽琼说，只要有灵感，设计师可以马上通过 3D 排版设计，大体感知效果，如果可行就能在打样间做出一个样品，最后在隔壁的走秀台，通过每周 10 多场的小模特走秀展示。而织里中国童装城也因此面貌一新，除了传统的面料交易、辅料采购，还兼具设计、打样、展示、营销拍摄为一体。

“现在织里童装主要在‘微笑曲线’两端，也就是在设计和销售上做文章。”叶芳萍表示，设计中心已经汇聚了近 20 个工作室，常驻设计师 240 人，服务全镇 3000 多家童装企业，去年设计开发的童装款式多达 1.5 万件。每天，都有新的童装款式被当场买走，有的成为当季热销品类。“2017 年 9 月，第四届中国·织里全国童装设计大赛收到海内外上千件参赛作品，参与进来的国内外设计师越来越多，说明织里童装设计逐步走向国际舞台。”叶芳萍说。

“整片的小作坊，一群群工人在操作台上缝制衣物，这是昨天的织里。”濮新泉说，品牌化经营后，企业同款童装的利润率至少提升 40%。“一线工人减少了，设计团队扩大了；车间劳动减少了，网上营销增加了。”在今童王园区内，有一片专业童装摄影场地，卧室、运动场、火车站、咖啡厅所有生活场景一应俱全，每到傍晚，都会迎来一波拍摄高峰。

2016 年开始，织里镇联合 13 个外地商会，合作异地办园。这些加工生产基地多向安徽的宣城和安庆、江苏的宿迁等地区转移，童装外发加工企业达 4000 余家，带动当地经济的同时，为织里换来腾笼换鸟的宝贵空间。“留下来的，一步步走向高端。企业加大技改力度，推动工艺、设备、产品升级。”盛柯介绍，镇上 50 多家试点企业引入打版、裁剪、吊挂等成套自动化设备，今童王、布衣草人等 13 家童装试点企业，投资 1.8 亿元完成“机器换人”。生产线上工人少了，从事电商、设计的人多了，后者目前已达数万人，是 2012 年的十几倍。

小网格实现大治理

随着童装产业发展，织里人口从 10 万人猛增到 45 万人，政府管理能力明显不足，被戏称为“小马拉大车”。

吕某、孙某在生产车间劳作时，一时未忍住烟瘾，被“智慧消防”系统发现，受到拘留两日的惩罚，罪名是涉嫌在具有火灾危险场所吸烟。这过于严苛吗？织里人可不这么认为。2006 年的两把大火给织里人带来刻骨铭心之痛，也给织里社会治理带来巨大变革。“当时的童装企业大多是一楼店铺、二楼厂房、三楼宿舍的‘三合一’作坊式生产，生产、生活、仓库混为一体，火灾发生无处逃生。”盛柯说，这次事件使织里童装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织里镇联手国家和省级消防部门专家，经过上百次试验和不断验证，最终创造性地让住宿和生产实现水平

小团队化解大难题

除了管理体制的改革，织里还提出“共享共治”，让新织里人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大姐，我们拿不到工资，没钱回家，你能不能帮帮我们？”2017 年年底，一家童装企业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企业主一夜间人间蒸发，20 多名工人的 40 多万元工资没了着落，眼看就要到春节了，工人们向有“侠义”之名的“平安大姐”求助。大姐们二话不说，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企业主的母亲，告诉她欠薪将给儿子带来的种种恶果，母亲思想松动后，她们又帮着联系买家处置设备和车辆，凑出部分钱款，并向工人担保不足部分年后付清。整整忙活 15 个小时之后，工人们满意走了，却有几位大姐病倒。最终，该企业主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因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受到了从轻处罚。

“平安大姐”创办人徐维丽是辽宁人，2003 年来织里创业，因性情耿直、热心公益，在织里女企业家中颇受欢迎。2015 年底，一群姐妹聚会，有人提议，既然大家都爱帮人，不如成立工作室，就叫“平安大姐”，并推荐徐维丽为牵头人。随后，不断有人加入进来，最终组成了一支特殊的调解团队，24 位来自全国 13 个省的“老板娘”组成的“平安大姐”工作室。

工友之间有矛盾，她们出面协调；本地人与外地人起了冲突，她们负责调停；政府政策须贯彻，她们来宣传引导。两年多来，“平安大姐”已为新居民调解各类纠纷 358 起，且没有一起被起诉。去年，她们还组建了“安姐实业有限公司”，所得利润全都用于公益活动。

“帮助群众快速有效地解决疑难问题和矛盾纠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织里镇开启的社会治理改革中，政府并非‘单打独斗’，而是积极鼓励社会团体‘共享共治’。”织里镇党委书记宁云认为，除了管理体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强化新织里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 2014 年开始，织里镇积极打造了“一个多元矛盾纠纷调委会+2 个调解中心+6 个二级街道调委会+51 个村居调委会+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层次矛盾纠纷调解组织网络。如今在织里，“平安大姐”“王金法广播”“平安公益联盟”和 13 个异地商会等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2017 年织里各类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高达 98.7%，多方力量共治效果已经显现，新老织里人的认同感、归属感、幸福感也不断提升。”宁云说。

专家访谈

“织里样本”核心是解放思想求实创新

——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宋建武

为了深刻了解“织里样本”，深入体会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带给我国社会的深刻影响，2018 年 1 月和 3 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团队在宋建武教授指导下两次前往织里实地调研，对织里镇四十年来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梳理。宋建武教授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文汇报：中国小城镇星罗棋布，织里为何能受到你们的特别关注？

宋建武：从南太湖岸边一条 0.58 平方公里的“扁担街”，到如今城市框架达 25 平方公里的“中国童装名镇”，织里镇是如何做到的？从产业发展要素的角度看，织里镇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也没有临近超大城市的区位优势，没有高新技术作依托，也没有国外大规模投资的拉动，却依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依靠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在童装领域形成了产业集聚，并不断实现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内生型的发展之路。

进入新时代，产业集聚、经济发展，带来了流动人口的激增，也给当地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织里人把握住了“人、产、城”这三大发展要素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律，创造性地找寻到一系列破解难题的方法。纵观织里镇近 40 年的历史，它既已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的辉煌，也发生过重大火灾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转型调整过程中，织里镇对产业发展和社

会综合治理模式进行了深度探索，经历了由乱到治的转变，是观察改革开放历程难得的典型样本。

研究分析“织里样本”必将深化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也能使我们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更深刻体会到党的十九大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判断的正确性，从而坚定我们的理论自信。

文汇报：织里镇在发展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

宋建武：总结织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和治理的经验，我们认为解放思想、求实创新、用足政策是核心。与织里的干部群众谈起织里的发展过程，几乎人人都会说到 1992 年 8 月“织里经济开放区”的设立。这在当时的湖州，甚至在整个浙江省都是一个创举。当时的织里镇党委书记回忆说，这完全是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学习深圳特区发展经验而采取的一个创新举措。“经济开放区”政策给予织里的自主发展权限之大，甚至超过了当时人们的期望。织里由此获得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机会。设立“织里经济开放区”后，织里镇党委政府敢于冲破思想禁区，坚持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经济体系，从制度上进一步探索了市场与政府作用的有效机制，深化改革，打通了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通道。

另外，织里镇能良好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重业亲商、服务为本、让利于民”的服务理念。与织里的企业家们谈到当地的党委和政府，大家最有共识的一个判断是：“织里的干部真的是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曾任织里镇党委书记的吴子性提到服务理念时，很好地总结了织里镇党委政府的特点：政府要做三件事，撑腰、跑腿、搞服务。40 年来，织里镇党委政府千方百计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依据产业发展需求提供必要服务，赋予产业充分的活力。除政商关系融洽之外，织里镇没有因为小企业纳税贡献少而管理难度大就对这个产业“另眼相看”，而是把童装产业看作是织里整个产业生态的基础，把童装产业发展带来的人口集聚效应，看作是未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源动力，从而采取了“让利于民”的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近年来，织里人民的需求从“富起来”逐渐转化为“好起来”，织里镇顺应时代发展，积极满足人民新的发展需求。一方面，以创新战略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合理使用，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体系，创造宜居环境，让发展真正地造福当地民众。

文汇报：为什么说织里镇是新时代湖州版的“枫桥经验”？其在治安防控和共享中共有何借鉴意义？